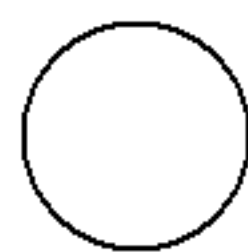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六二年 12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 ★

目 录

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几个问题 赵 璞 (1)

——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著作的体会

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甘子玉 (14)

关于选择研究题目 严中平 (18)

农村人民公社干部应该加强

经济核算观点 陈 因 (28)

说鞭策 吴介民 (32)

美法交恶：西方外交万花筒上的一个新镜头 张振亚 (34)

丑恶的“形象” 胡思升 (38)

☆ 六月十六日出版 ☆



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几个问题

——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著作的体会

赵 汉

我們党的干部政策，是我們党的組織路綫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澤东同志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詳尽地論述了党的干部政策。他充分地估量了干部問題的重要意义，全面地分析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并且从这一点出发，对挑选干部、識別干部、提高干部、团結干部等一系列的問題，都做了精辟的分析和具体的指示。

毛澤东同志对干部政策問題的論述，是同他对党的建設的其他方面的論述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內容十分丰富。这里，只就其中的几个問題，提出自己在学习中的一些体会。

一、党在干部問題上的出发点

毛澤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視干部問題，并且把这个問題同我国的革命和建設事业紧紧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說过：“指导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党，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①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偉大革命斗争的党，沒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②对于干部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毛澤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說过：“經濟建設运动的开展，需

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他們是經濟战綫上的指揮員，而广大群众則是战斗員。”^③他在一九五六年最高国务會議上又說：“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內，努力改变我国在經濟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偉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④。

一切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都必须有自己的統治人材。离开了干部，政权問題就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工人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权，当然也必须有自己的领导人材，必須組織和培养自己的干部。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它不是以一种剝削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剝削形式的革命，而是旨在消灭一切剝削制度和一切剝削阶级的革命。工人阶级絕不能通过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

① 《为爭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斗争》。《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7頁。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4頁。

③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9頁。

④ 見《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第1頁。



自己的目的，而必須彻底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为了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需要培养大批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等方面的干部。当工人阶级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不可能足够地准备好这样的干部。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对旧社会来的人材要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一方面还必须大量地培养各方面的新的干部。因此，工人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干部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组织任务。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权问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党和国家要经过干部来集中群众的意见，以便根据群众的意见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法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法令，要靠干部去组织领导群众具体执行。人民群众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法令的意见，也要通过干部集中起来，反映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党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良作风，要靠干部去身体力行和发扬光大。没有干部，党的领导就无法实现。可见，干部问题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强调干部的作用，决不是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决不是离开人民群众而孤立地强调干部的作用。我们共产党人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来观察人类社会的。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我们的工作能够取得伟大的

成绩，一定是：一方面，由于领导机关制定了适合广大群众需要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干部善于贯彻党的政策、取得群众的信任，善于依靠、动员、组织和发挥群众的力量。这两条缺一不可。干部必须依靠群众。干部脱离了群众，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干部只有在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前提下，在他们的行动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够起自己所应该起的作用。如果认为干部可以在人民群众之外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无疑是极大的错误。同时，人民群众也必须有自己的领导骨干。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只有在正确的领导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因此，不应该把干部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对立起来。当我们谈到干部的作用的时候，也正是指干部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使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作用。在确认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地估量干部的这种作用，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最忠实的代表者。我们的党和国家，都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个出发点，也就是我们在干部问题上的出发点。我们的干部，本来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脱离群众的特殊阶层。他们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产生

①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1095—1096页。



出来的。他們能够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担任领导工作；也能够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担任领导工作的时候，他們也只能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我們的干部，既是人民群众的老师，又是人民群众的学生；既是人民群众的领导骨干，又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員。他們必須按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办事，必須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如果他們中間有人不為人民群众办事，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心，他就随之丧失了繼續担任干部的基本条件。刘少奇同志說：“正因为我們重視人民群众及人民群众的事业，我們才特別重視人民群众的干部。我們重視干部，是从重視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并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的观点而去孤立地重視干部，不是为重視干部而重視干部。”^①

在干部問題上，我們和一切剝削階級統治集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們党在干部問題上的全部政策，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的；而一切剝削階級統治集团，都是从他們少数人的利益出发的。他們之所以重視干部問題，是指望依靠少数臣僕来維系对人民的統治。弄清楚党在干部問題上的出发点，对于正确地领会和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是很有好处的。

二、使用干部問題上的两个对立的路綫

毛澤东同志說：“在这个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綫：一个是‘任人唯賢’的路綫，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綫。前者是正派的路綫，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綫。”^②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只是一味地重用皇亲、外戚、近侍、佞臣，而对比較正直、清廉、聪明、能干的人，却加以排斥和摧殘。他們本想用这样的干部政策来籠絡亲信，駕馭臣下，統治人民，維持自己至尊无上的地位。但是，結果总是适得其反，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他們的統治基础，不是挽救了而是加速了皇朝的崩潰。这种情况，不能光用帝王个人的昏庸无能以及群臣之間的排挤傾軋來說明。这是封建階級黑暗統治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所必然产生的現象。

也有一些比較英明的帝王，敢于跳出狹小的圈子，到比較广泛的范围中去物色“賢才”。唐太宗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唐太宗主張“求賢”、“审官”、“納諫”、“去諛”。他說：“为国之要，在于进賢退不肖，賞善罰恶，至公无私”；“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竞进”；“吾为官擇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讎不棄”。他根据“广求賢人”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亲、疏、新、旧的关系，把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等一批优秀的文臣武将团結在自己的周圍，充分地运用了他們的力量。即使是“犯顏干上”、“狂言直諫”的人，如果他认为确实出于忠心，所提的意見对他确实有利，他也能夠看重他們，团結他們，采納他們的意見。魏徵是历史上著名的、有才干的諫臣，对唐太宗多次提出过批評。其

^① 《論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89頁。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頁。



中有些意見相当尖銳，措辞相当激烈。唐太宗却不以为忤，很重視魏徵。魏徵死后，他还思念不已，說：“人以銅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鏡，可以見兴替，以人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①

像唐太宗这样比較英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止一个。他們确实选用了一些“賢才”、“諫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有利的作用，因而对人民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一切历史人物，都有他們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一切剝削阶级的統治者，都是按照剝削阶级的政治标准去使用干部的。他們所謂的“賢才”，必須是忠于“君”、忠于当时統治阶级、并且善于为当时統治阶级效劳的人。他們的这种政治标准，是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

和一切剝削阶级相反，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在使用干部的問題上，实行了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任人唯賢”的路綫，是同人民群众对干部的要求完全一致的。

毛澤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綫，服从党的紀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謀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綫。”^②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澤东同志把干部的条件概括为“德”和“才”两个方面。我們党遵循着毛澤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在干部条件上一貫坚持了“才德兼备”的标准。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一方面为了防止和克服只重視业务、忽視政治的傾向；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和克服空談政治，不重視钻研

业务、学习技术的傾向，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又紅又专的口号。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說：“又紅又专，这是全国知識分子和技术人員的前进道路，也是我們全党各級干部的前进道路。”^③又紅又专这个口号，是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一致的。

由此可見，我們党在使用干部問題上所說的“賢”，包含着“德”和“才”这两个方面的內容。“德”，是指政治品质。“才”，是指业务能力。在“德”的方面，要求每一个干部忠实于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地执行党和国家交給的任务，努力为人民服务。每个干部都应该在这个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于党员干部，則应该有更高更严的要求，他們必須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站穩工人阶级立場，貫徹执行党的政策，服从組織決議，遵守党的紀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才”的方面，要求每一个干部，都掌握一定的业务知識和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能够把工作切实做好。对于党员干部，則要求他們要更多地懂得党的政策，并且在工作中，在提高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方面，起模范作用。当然，对从事不同工作的干部（例如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和从事技术工作的干部）在德才方面的具体要求是不能完全相同的。在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时候，必須从每一項工作和每一个职务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而不应该强求一律。

① 以上引的唐太宗的言行，参看《資治通鑑》唐紀。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頁。

③ 《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頁。



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毕生为之努力的方向。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该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加紧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的修养，努力通晓和掌握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精通业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德和才这两个方面的水平，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古人说，“德”是“才”之帅，“才”是“德”之资。一个干部，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才能够自觉地发挥和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如果对人民的事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不用积极的和谨慎的态度去做工作，他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但是，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句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它只有通过每个干部做好自己份内的业务工作才能体现出来。我们的干部，越是认真钻研业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就越能做好工作，也就越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如果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和热情，没有一定的政策水平，缺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因此，必须把德和才、红和专结合起来。

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德和才是统一的。党所要求于我们干部的德，是为人民服务的德；党所要求于我们干部的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才。刘少奇同志曾经把党的干部标准用一句话来概括：“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①凡是人民群众认为“贤”的干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就坚决地使用他。凡是人民群众认为“不肖”的人，任何领导机关都不能违反人民群众的意志而把他强加于人民群众。这就是

我们党的“任人唯贤”的路线。

长期以来，我们党在使用干部方面，曾经不断地向“任人唯亲”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一些人，实行过“任人唯亲”的错误路线。像张国焘和高岗、饶漱石等，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不惜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拉拢亲信，排斥“异己”，组织宗派，阴谋篡党。除此以外，有的领导干部，在使用干部时从不纯的个人动机出发，也犯过“任人唯亲”的错误。这种“任人唯亲”的错误，不论它用什么形式出现，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乃至封建宗法思想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的反映，必然会给我们党造成危害，这在我们党内都是不合法的，从来都是受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党内一切正直的同志的坚决反对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的，过去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②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是根据“任人唯贤”的路线建立起来的。人民群众亲切地体会到，我们党的使用干部的路线是正确的。他们对于党和国家的干部总是给予很大的信任。为了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有责任更加谨慎地执行“任人唯贤”的路线，慎重地选拔和使用干部。

^①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0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页。



同时，我們每一个干部都应该用党所提出的干部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样，群众对于干部就会更加信任，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联系就会更加密切。

三、在执行“任人唯賢”的路綫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为了正确地执行党的“任人唯賢”、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首先对于德才兼备的原則要有正确的認識。

党和国家要求我們每一个干部既要关心政治，又要钻研业务。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灵魂。如果取消了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任何干部都应该承认政治的重要性，承认政治必須挂帥的原則，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但是，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們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們是为經濟基础服务的。如果离开了經濟工作、技术工作等实际工作，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就无从談起。我們党所說的政治挂帥，指的是党的路綫挂帥，党的政策挂帥。每个干部，应该在党的路綫和政策的指导下，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把实际工作做好。只有做好实际工作，才能具体地貫徹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毛澤东同志总是教导我們不要做空頭政治家。把政治付之空談，看上去好像很关心政治，实际上对人民毫无用处。一个干部，如果不去钻研业务，不去做好自己崗位上的实际工作，就說明他并没有真正实行政治挂帥。要是发现了这种不好的傾向，領導上就有責任帮助他糾正过来，把他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当然，我們的干部也不应该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如果只注意业务，不去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端正立場观点，以致在实际工作中違反了党的路綫和政策，那也是錯誤的。这种錯誤也必須糾正。这种錯誤，不在于认真钻研业务，而在于离开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钻研业务这一件事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加以非难。钻研业务同輕視政治沒有必然的联系。真正关心政治的好干部，应该是刻苦钻研业务的模范。如果因为某一个干部认真钻研业务，就认为他輕視政治，显然是錯誤的。

党和国家要求我們每一个干部既要有动脑筋、提意見的积极性，又要有服从組織的紀律性。是不是服从領導，执行決議，能不能遵守組織紀律，是判断一个干部政治品质优劣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对于任何工作、任何問題，人們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种正常的現象。一个干部，通过正当的組織手續，对工作提出意見或者对領導上提出批評，这正表現了一个干部的积极性。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說：“处在偉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發揮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謂發揮积极性，必須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发表意見、批評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監督作用。沒有这些，所謂积极性就是空的。”^①任何干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版，第317頁。



部，只要他在遵守組織原則的範圍內，向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提出意見、提出批評，都是合法的、正當的。如果他的看法有不正確的地方，也不應該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說成是組織紀律上的錯誤。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能夠經常地保持生氣勃勃的革命朝氣，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正確，當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的時候，總是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及時地發現和糾正，正是因為我們有着為數眾多的這樣的好幹部。

黨和國家要求每一個幹部既要完成任務，又要執行政策。能夠堅持走群眾路線，對群眾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又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務的幹部，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好幹部。有的幹部，雖然在行動上沒有違反黨的政策，但是沒有完成經過努力可以完成的某些工作任務；也有的幹部，在完成某些工作任務的過程中，違反了黨的政策，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損害黨和人民的聯繫。對於這兩種情況，都要教育幹部注意糾正。黨的組織，對於每一個幹部的工作，應該把他完成任務的情況和他執行政策的情況，以及他在工作中所採取的方法和作風統一起來，進行全面的評價；而不應該僅僅把其中的一個方面作為衡量幹部的標準。

除此以外，如果僅僅根據幹部的家庭出身、個人經歷、社會關係去判斷他的政治品質，而不去具體地了解他的政治態度、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如果把業務能力僅僅理解為幹部的文化程度，而不全面地了解他的業務工作能力；如果把幹部的德才的高低簡單

地和他的資歷的深淺等同起來，而不看他現有的水平和在工作中的實際表現；所有這些看法都是不正確的。如果按照這些不正確的看法去挑選和使用幹部，都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偏差。

為了正確地執行黨的“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對於幹部的具體情況還要有全面的了解。當我們正確地理解了黨的幹部政策的時候，如果知人不明，還可能用人不當。

毛澤東同志很重視識別幹部的工作。他說：“必須善於識別幹部。”^①他要求我們“對於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應該採取分析研究的態度。”^②一個一個地對於幹部進行全面的深入的考察了解和分析研究，當然是十分繁重而又十分細緻的工作。但這是正確地執行黨的幹部政策的基礎，是決不能忽略的。

毛澤東同志還具體地指出：“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③如果違背了這種方法，就會在識別幹部的工作中陷入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個人的政治觀點、思想作風和工作能力，往往要在較長時間的工作中，通過許多次的反復，才能比較全面和比較清楚地表現出來。要正確地識別幹部，就必須從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中去看他的實際表現，不能單憑幹部一時一事的表現來作出判斷。有一些在工作

①③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頁。

②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5頁。



中脚踏实地，讲求实效，说得少，做得多，真正埋头苦干的干部，乍看起来似乎并不出色，并不引人注目；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是一步一个脚印，经得起检查和考验。如果不从本质上进行考察，仅仅根据一时的、片断的表面现象来判断一个干部，是难保不犯错误的。

干部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常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对干部要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有分析的头脑，养成分析的习惯，不要对复杂的问题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①对于任何一个干部的优缺点，只要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要如实地承认它们，如实地分析它们。“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②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从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着眼。如果因为干部在某一项工作上有了某些成绩就不再去注意他在其他方面存在的缺点，或者因为干部在一件事情上犯了错误就抹煞他在其他方面的成绩和优点，都是很不妥当的。

对干部要善于用其所长，补其所短。干部的“德”和“才”，总是越高越好。人民群众对干部寄以这样的期望，干部本人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人。“德有所不至，才有所不能”。人总是有优点和长处、同时又有缺点和短处的。因此，在使用干部的时候，要注意发扬他们的优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及时帮助他们克服缺点，补足短处。

考察和了解干部，不能只凭固定不变的

老印象，必须把干部的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的干部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从历史上考察其根源，帮助他认识产生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要因为一个干部犯了偶然的、个别的错误就去算老账、算总账。

要了解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防止在识别干部工作中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必须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考察结合起来，必须充分依靠群众。我们的干部，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众（包括同级干部和被领导干部）之中，并且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活动。群众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上，帮助领导机关识别干部。如果群众反映的情况同干部在领导机关面前的表现相一致，固然可以加深和充实领导机关对干部的了解；如果不一致，也可以对原有的了解加以检验或者修正。

在考察和了解干部的时候，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就可以使领导机关既了解干部完成任务和执行政策的好坏，又了解干部思想作风的优劣；既了解干部在执行领导机关的指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干部在实现当地群众的某些特殊的具体要求方面的情况；既了解干部在领导者面前的表现，又了解干部在被领导者面前的表现；既了解干部的各个方面的概况，又了解干部的某一方面的详细情形。这样，无疑要比单纯从哪一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更确实、更全

① 参阅《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3、952页。

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5页。



面、更深刻。

领导机关注意了解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不仅对于识别干部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可以推动干部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利益，遇事同群众商量，自觉地把自已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领导机关这样做，还可以使群众主动地关心干部，监督干部，帮助干部不断地进步。

四、培养和提高干部

培养和提高干部，是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更高的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具有更多的生产斗争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党的组织必须认真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钻研本行业务知识，使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逐步精通自己的业务，切实做好工作。

组织干部学习，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这条基本原则。在指导干部学习理论的时候，要使干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同实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实践是最伟大的学校。实际工作中的一切成功的和失败的事例，都是我们最好的教材。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从战争学习战争”^①的著名口号。我们党的许多领导骨干，就是在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教导我们：“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

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②这就要求我们从建设学习建设，在建设实践中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要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做工作，从实践中增长知识。

我们党的实践证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认真地总结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在新的任务面前，我们大家都缺乏经验，“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③在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工作中，都有着成功的和失败的纪录，都有着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认真地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我们的事业就会不断发展，干部也就会不断提高。经验是干部和群众实践的产物，只有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向各种专家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从实际出发，集中干部和群众的智慧，才能够从经验中总结出科学的结论。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使大家畅所欲言，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各自的见解，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把大家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片断的零星的经验上升为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经验，使大家分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达到统一的全面的认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和风细雨、心情舒畅的气氛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总结经验，是培养提高干部的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4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38页。

③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0页。



培养和提高干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关心干部的业务学习。党的各级组织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使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能够刻苦钻研本行业务，成为本行本业的专家。为了使干部熟悉业务情况、钻研业务、积累经验，就必须使干部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干部的专业在可能条件下保持稳定。

领导干部本身起模范作用，善于指导干部，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一个重要环节。领导者的一举一动，常常对干部起着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优秀的领导者可以为党带出一批好的接班人。所以，就党的组织来说，在整个培养提高干部的工作中，应该首先地并且着重地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水平。就各级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来说，更要以严肃负责的精神，加强党性锻炼，提高领导水平，为被领导者树立德才兼备的榜样；同时，还应该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贯穿到自己的行动中去，贯穿到布置工作、检查工作、总结工作中去。

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去指导干部：“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①凡属方针、政策和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则问题，一定要抓得很紧，耐心教育，使干部真正懂得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和思想作风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如果只布置任务，不交代政策和基本的工作方法，或者语焉不详，不针对干部的思想疙瘩把道理讲清楚，就不能帮助干部正确地进行工作。至于在细节问题上，在那些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具体问题上，就应该让干部根据具体的情况和群众的经验，

去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机械地、硬性地、烦琐地划出许多不必要的“框框”，不仅不利于锻炼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而且也不利于养成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

要认真地、及时地、深入地检查干部的工作，并且通过检查来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②检查工作，一般要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马。不能让那些不懂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作风飘浮的干部去负责检查工作。在检查时，既要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也要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既要了解工作中的问题，也要了解干部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中的问题；既要听取干部的汇报，也要倾听群众的反映；既要看到工作中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又要看到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失败的教训。发现了当地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帮助干部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积极地找出改进办法，鼓励干部进一步做好工作，而不应该简单地斥责了事。发现了领导机关自身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自我批评，改进工作。总之，要通过检查，给干部以切实的帮助。

为了帮助和督促党的干部逐步提高自己，改进工作作风，必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要教育干部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

党的组织应该像慈母一样地爱护干部，

^{①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516页。



應該在政治上、思想上關心干部的成長，關心干部的工作條件，珍惜和愛護干部的積極性，使干部親切地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使他們能够做好黨和人民交給他們的工作。

五、黨的團結干部的政策

我們要不斷地加強全國人民的團結，不斷地加強人民群眾的領導骨幹的團結。我們必須加強全黨和全國干部的團結，使黨員干部和非黨干部、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漢族干部和少數民族干部、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劉少奇同志說：“我們干部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不是以私人生活上的利益和感情來作團結基礎的，而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上的一致，來作為團結基礎的，而是以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綱領，來作為團結基礎的，而是以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來作為團結基礎的，而是團結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之下的”^①因此，干部的團結和進步，是不能分開的。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越高，干部對黨的路線和政策的認識越透徹越明確，干部的團結就越鞏固，也就越能同心同德，做好革命和建設工作。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他說：“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②這是一個意義十分深刻的指示，需要我們認真領會。要把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團結

好，並不是困難的。比較困難而又容易被忽略的，是如何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的問題。

有的同志，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見看成是進行工作的障礙，或者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見簡單地同錯誤意見混為一談。這種認識是不利於工作，也不利於團結的。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不同的看法，常常可以促使大家更全面更縝密地考察問題的各個側面，從而作出更加切合實際的決定。因此，把不同的意見提出來，這是達到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的一個正常的、必要的步驟。如果聽不到不同的意見，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認識就容易陷入片面性。在工作中，有少數同志提出與多數同志不同的意見，這並不是什麼不好的現象。有時，少數同志和多數同志有了分歧的意見，到底真理在哪一方面，需要到實踐中才能得到最後的證明。我們應該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採取謹慎和耐心的態度，團結共事。這就是說，對於不是迫切的、急需付諸行動的問題，如果意見不一，就應該繼續調查研究，不必急於做出結論。對於需要及時作出決議的問題，則必須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這就是必須按照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去行動。在這樣做的時候，對於仍然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或者個別的人，只要他們在行動上服從決議，就應該允許他們保留意見和向上級領導機關提出意見。正如鄧小平同志說的：

^① 《論黨》，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2頁。

^②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4頁。



“这对于党不但沒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只要党的決議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見的党员又是願意服从真理的，他們終于会心悅誠服地認識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錯誤。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認識真理。”^①

对于犯了錯誤的干部，應該幫助他們認識和改正錯誤。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結論中指出：“我們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們一道工作。”^②毛澤东同志关于團結犯过錯誤的干部的政策，是大家所熟知的。党对于干部所犯的錯誤，是要坚决糾正而决不迁就姑息的。但是，对于犯了錯誤的干部，党总是本着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幫助他們走上正确的道路。对于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是决不能用简单的粗暴的組織上的惩办去糾正的。毛澤东同志說：“我們揭发錯誤、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医，不固执錯誤，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願意医治，願意改正，我們就妥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魯莽的态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③对于干部的缺点和錯誤，一定要从團結的願望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計，把思想認識問題和政治問

題、小是小非問題和大是大非問題、偶然的个別的錯誤和一貫的系統的錯誤严格地区別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團結好同志。对于犯了錯誤的干部，一定要坚持党的正确政策，用同志式的态度，与人为善地幫助他改正，热情地爭取和欢迎他进步，这是正确对待同志的原則問題，是关系到党的團結的原則問題。毛澤东同志說：“对于人的处理問題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这是我們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④

党的組織，不仅有責任把党內的广大干部團結好，而且有責任把党外的广大干部團結好。毛澤东同志曾經多次指出：“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們”^⑤。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別人、壟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⑥无

- ①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頁。
- 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4頁。
- ③ 《整頓党的作风》。《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9—830頁。
- ④ 《学习和时局》。《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2頁。
- ⑤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頁。
- ⑥ 《在陕甘宁边区参議会的演說》。《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1頁。



論黨員幹部還是非黨幹部，都是為着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工作的。大家應該在這個共同的目标下親密團結，互相關心，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學習。我們黨對於廣大的非黨幹部，同對待黨員幹部一樣，一視同仁地執行着“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政策，一視同仁地執行着提高幹部和團結幹部的政策。如果埋沒黨外的人材，這是黨和人民所不能允許的。

建國以來，非黨幹部在全國幹部隊伍中的數量空前地增加了。他們分布在各个方面。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擔負着各種重要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加強黨和非黨幹部的團結，意義就更加重大了。

十三年來，廣大的非黨幹部同黨員幹部一起，同甘共苦，為祖國和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由於黨的培養教育和他們的自覺努力，他們在思想、政治上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一般地說，從舊社會來的非黨知識分子幹部，經過十三年的鍛煉，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黨組織的責任，是要進一步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心情舒暢地、自覺地、逐步地進行自我改造，進一步克服資產階級和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樹立工人階級思想。有一些非黨幹部經過自我改造，已經參加了共產黨。應該看到，就總的趨勢來說，非黨幹部和黨員幹部在政治上的差別性將會逐漸縮小，共同性將會逐漸增加。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對許多非黨幹部在政治上的

進步估計不足，不給他們以應有的信任，不去大膽地放手地讓他們工作，這是不利於團結的。當然，如果只看到非黨幹部和黨員幹部的共同性正在逐漸增加這一方面，不承認他們之間客觀存在的差別，就會忽視非黨幹部的具體特點，或者放鬆對他們的幫助，或者用黨員幹部的標準去要求他們，那也是錯誤的，不利於團結的。

正確地執行黨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是維護團結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要加強團結，就必須分清是非。而黨的幹部標準問題，也正是在廣大幹部中提倡什麼和反對什麼的是非界限問題。對幹部的提拔、表揚或者批評、處分，都是一定的是非界限的具體體現，都會對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其他各个方面，首先是幹部的團結方面，發生重大的影響。因此，為了維護和加強幹部的團結，必須堅決地貫徹執行黨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同一切違反黨的幹部政策的現象進行鬥爭。

我們的許多老干部經歷過戰爭和革命的烈火的鍛煉。許多年輕的幹部正在黨的優良傳統的影響下，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斷地成長起來。我們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有了一支強大的幹部隊伍。他們分布在各種不同的崗位上，和人民群眾在一起，進行着辛勤的工作。正確地執行黨的幹部政策，我們就一定可以進一步提高幹部隊伍的水平，進一步加強幹部隊伍的團結，更充分地發揮廣大幹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性。



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护

· 甘子玉 ·

我国富饶的自然資源为社会主义建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国人民正在大規模地展开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資源，必須更好地保护自然資源。把利用和保护自然資源正确地結合起来，不但是当前生产建設中的重要問題，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設的长远利益，應該引起人們的普遍注意。

对于自然資源，既要利用，又要保护，这就需要恰当地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自然界是統一的，各种自然現象相互影响、相互制約，形成大自然有机的整体。人們在进行某一种生产活动、变革某一项自然条件的时候，如果只从眼前的狭隘

的利益出发，采取不适当的措施，忽视了这些措施对自然界各方面的和长远的影响，就有可能使某些自然資源和自然条件受到破坏。这种濫用自然和破坏自然的后果，往往在短時間內还看不出来，然而等到它的后果显著地暴露出来以后，就会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的損失。因为自然資源和自然条件一旦遭到破坏，常常需要用很大力量和較長時間才能补救，有些甚至是很難补救的。

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要学会統治自然，必須学会估計我們的生产行为对自然界的长远影响。在談到人类历史上濫用和破坏自然

資源的情况时，恩格斯說：“可是我們不要过于得意我們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們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們。每一次的这种胜利，第一步我們确实达到預期的結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常常正好把那第一个結果的意义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細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却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蕪不毛之地，因为他們把森林砍完之后，水分积聚和貯存的中心也不存在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因为要十分細心地培养該山北坡上的松林，而把南坡上的森林都砍光了，他們預料不到因此却把他們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給摧毁了；他們更預料不到这样就使山泉在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枯竭了，而且在雨季又使洪水傾瀉到盆地上去。”^①

濫伐森林，不适当的垦殖，过度的放牧，不合理的耕种等濫用自然的現象，在階級社会，在科学技术水平較低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尽管人們依靠科学知識已經能够估計到生产活动对自然的較远的影响，許多科学家也提出过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資源的各种方案，但是，对自然資源的掠夺式利用仍然十分严重，破坏自然的現象繼續加剧，这是由資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决定了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自然資源的蹂躪劫掠，更是到了駭人听闻的程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們才能为整个社会、为长远利益打算，运用科学技术的成就，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自

^① 《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5—146頁。



然资源，有计划地实现改造大自然的理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①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影 响愈来愈大，利用自然的广度和深度必然日益增加。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从利用和保护自然的角度来说，自然界中的资源可以分作两类。有一类自然资源，主要是各种矿产资源，被人们开发使用以后，是不能再生长出来的，或者是只能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才能生成的。另一类自然资源，主要是农、林、牧、副、渔业和水利方面的资源，像土壤肥力、森林、水力、动物和植物等资源，如果能合理利用、合理经营，在使用后是可以不断地恢复或增加的。

对于不能再生长出来的矿产资源，除了要注意综合利用以外，还应该注意合理开采和矿产保护。在开发矿产的时候，要按照各种不同的矿物、矿区地质和地形条件等情况，制订合理开采的规程。对于特殊、稀有的矿产，更要严格遵守特定的采掘方法和利用方法，严格防止发生破坏与滥用资源的现象。在采掘业的生产过程中，一般需要有生产准备、开采、运输等许多必要的环节，如果人们违反这种程序去开采，就难以持续地、顺利地 进行生产。例如在采煤工业中，正确处理开拓、掘进、延伸、回采、运输等各个工作程

序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生产正常进行，使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在同一矿区中，对品位高的富矿和品位低的贫矿，也要根据利用和开采的技术水平，规定合适的开采比例和方法，防止净吃富矿、抛掉贫矿的现象。今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对矿产资源的品种与数量的需要，将会越来越多。为了适应今后发展的需要，矿产资源的勘察、开采和保护工作，应该得到更加密切的结合。

对于可以再生长出来的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涉及的因素更多，影响更广。

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农业生产中，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是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错着的。动植物的生长、发育、繁殖，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自然条件（如气温、水分等等），这个自然再生产过程是农业的经济再生过程的根据。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运用科学技术，缩短或延长自然再生产过程的时间，改变它所需要的自然条件，但是，不能取消这个过程。因此，农业生产在更大程度上受着自然条件的影响。如果人们对这些自然再生产过程施加了破坏性的或不良的影响，就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在农业的经济再生过程中表现出来。反之，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结合得很好，农业上的自然再生产过程进行得更好，那就会对农业的经济再生产过程发生积极的、有利的作用。

例如，森林和其他植被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就是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题。拿黄河流域来说，在古代原是林木葱茂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由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

^①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接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条件的限制，人們采取了錯誤的垦殖方式，把自然森林砍伐精光了，使水土流失逐年加剧，气候日趋干旱，河道中泥沙淤塞不断增加，黄河下游河底高于两岸平原。三千多年来，黄河下游发生泛滥、决口一千五百多次，尤以明代以来更为频繁严重。清代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自然的破坏继续加剧。这就是黄土高原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许多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根本原因。长江流域的情况比较好一些，但是植被复盖也受到一定破坏，例如在江西、湖南一带的紅土区域中，由于山上森林砍伐过度和陡坡开荒、土壤風化等原因，到了近代，紅土已經裸露，并出现了若干成片的沙荒现象。广东的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上的热带森林，由于历史上的燒山和不恰当的垦殖，許多乔木林已变成灌木林，有些又由灌木林变成了草地，到近代已經出现一些由草地而退化形成的“人为沙漠”。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一經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立即着手医治历代封建皇朝、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自然界的創伤，用持續而辛勤的劳动，努力創造一个更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环境。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然状况的調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开展，广大人民群众組織起来，进行了大规模的造林、育林、水土保持、改良土壤等工作。治黄、治淮以及其他水利工程也大规模地开展，山区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治理沙漠的試驗开始进行。这些都对自然条件的改善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保护和改造自然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工作量是很大的。和我国广大的幅員比較起来，我国现有的森林面积还是比较小的，水土流失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

是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还远远沒有完成，西北高原和华北平原气候干旱的問題还需要作巨大的、长期的努力才能解决。而且，由于有些自然保护工作还跟不上需要，有关科学技术知識还不够普及等原因，在个别地方，还存在着不适当的垦殖、燒山以及違反水土保持要求的耕作等现象。因此，造林、护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工作，仍然需要引起我們极大的重視，并有計劃地認真地进行。

在我国广大的自然界中，还存在着种类繁多的有益的禽兽、昆虫、水生动物和有用的野生植物。这些动植物资源具有很大的經濟价值。注意保护和合理利用，就可以使它們不断繁殖孳生，如果濫捕濫采，就可能日益减少，甚至有灭种的危險。許多地区，根据科学研究的結果，对若干动植物资源采取了保护、养殖的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保护自然资源，不是消极地保存原状，而是要把利用和保护結合起来，防止不正确的利用方法，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和充分的利用。例如，在山区生产建設中，对农田、林場、牧地应该因地制宜、全面安排；造林、护林和水土保持工作应该与当前农业生产密切結合，对自然条件的改良治理，应该远近兼顧、长短結合，并且分清輕重緩急，首先抓紧对近期生产有利的措施。山区的开荒和治山要配合进行，开一片荒就治一片山，随开随治，尽量不让开垦的土地发生水土流失的现象，并防止在不宜开荒的陡坡上开垦。例如山西的雁北专区，解放后十多年来积极进行山区建設，植林护林和农业生产密切結合、互相促进，全区林地面积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五点六倍，区内桑干河两岸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这个专区中風沙災



害較重的金沙滩公社，由于撫育了防护林带，風沙侵襲减少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牲畜都有了增加。这种自然条件得到改善、农林牧业协调发展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山区是很不少的。許多事实都证明，只要我們尊重自然規律，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把利用和保护这两方面的工作結合得好，我們就既能在当前生产中收到效益，又能从根本上逐步改善自然条件，使之在今后长远的生产中发生有利的作用。

此外，我們在注意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明显的經濟价值的自然資源和自然条件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和保存某些对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的自然条件。例如各种典型的自然景观(如若干有代表性的原始林等)，典型的地质剖面，各种珍贵禽兽和奇花異木，以及主要的化石产地等，这些东西就好像是在大自然这个“博物館”里的“陈列品”，对人們研究有关自然历史和自然条件的科学問題，具有很大价值。保护和保存这些自然条件，能够幫助我們进一步探索自然規律，因此，归根到底也是为更好地利用自然資源所需要的。

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資源，使它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提供更多的財富，是一项长期、复杂、細致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須更好地了解自然，对自然界各因素进行調查研究，掌握自然变化的規律性。对于一个区域的自然状况，常常需要进行綜合考察，不是单纯从个别产业部門的角度而是从綜合开发利用整个自然資源的角度来周密地了解自然。必須認真总结当地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經驗，考查国内外相似情况下自然状况变化的历史經驗和教訓，应用自然科学理論和技术成果，并进行

社会經濟的分析，才能制訂出較好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資源的方案。

在一个地区中，各项自然資源怎样开发利用，采掘、加工工业和农、林、牧、副、漁业怎样配置发展，自然条件怎样改良等等，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除了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經濟条件和技术条件外，还必须从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出发。推行某些变革自然条件的生产、建設措施，对现有农业生产方法的改变以及其他改造自然的行动，必須事先經過深入的研究，广泛征求群众和有关科学技术工作者、經濟工作者的意見，并通过一定的典型試驗，确实弄清楚其效果之后才能实施。例如，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兴修水利的方案、森林的采伐和更新方式、土壤改良的措施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防治方法等，都是关系到重大的技术政策或技术措施的问题，必須集思广益，充分討論，通过必要的試驗，证明它确实具有比較充分的科学根据，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有准备、有步驟地进行。

我們祖国富饒的自然界，是供应我們一切原料和动力的“仓库”和“工厂”，正确地利用它、保护它，就可以永續不断地为我們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資源。我国地域辽阔，許多地区、許多資源都还没有經過科学的調查和勘察，还有許多天然宝藏沒有发现；就是已經发现的資源，也还远远沒有全部开发和充分利用。为了使大自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了造福我們的子孙后代，我們必須珍惜祖国的山河草木、矿藏农田，更好地掌握自然发展的規律，利用和改造自然，使我們祖国的自然界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富饒美好，錦綉如画！



关于选择研究题目

· 严 中 平 ·

同志们常问，科学研究工作到底怎样搞法？科学研究工作的方法问题，归根到底乃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方法，是和他的立场、观点密切相关的。有关立场、观点的问题，我不想多说。我只能就有关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很可能有偏颇乃至错误的地方，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提出问题，引起讨论罢了。

选定什么研究题目，这是搞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当然是实际需要，即社会实践中的需要、思想战线上的需要、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上的需要。但科学研究工作，就其本身来说，也有它的正常秩序。让我先从这个问题的说起。

一、按照科学研究的正常秩序，从小处入手

首先应该明确，选好科学研究题目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项研究工作。这是需要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具有一定的认识，才能办好的事情。过去我们有的同志，在跨开选题这第一步时就走错了地方。他们走错地方的原因，主要的就在于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还不很熟悉。

每门科学都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个

研究对象包含许多事物的一系列发展过程。这些过程的相互之间，有联系，有矛盾，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人们在某一门学科里选择研究题目时，可以挑选其中许多事物的复杂过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也可以挑选其中个别事物的单一过程，乃至过程的某一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性的研究。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认识规律需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①这里说的是，从个别事物到一般事物的认识的秩序。

毛泽东同志又说：“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②而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就是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

• 这篇文章，是作者根据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编写组讨论研究方法问题时的发言整理成的几篇文章中的一篇，参加这次讨论的多数是青年同志。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0页。



树木，不看見森林。这里說的是，从矛盾的各个方面到矛盾的总体的認識的秩序。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济学“首先研究在生产和交換的发展上每一个別阶段的特殊規律，只在这样研究的結末，它才能确立极少的非常一般的、可以用于一般的生产和交換的那种規律”^①。这里說的是，从个别发展阶段到发展全程的認識的秩序。

經典作家的这些提法告訴我們，人类認識过程是：由个别事物达到諸多事物，由个别方面达到全面，由特殊規律达到一般規律。我領会毛澤东同志所說“人类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②，就是指的这个过程。

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具体談到我們研究近百年中国史的方法时指出：“应先作經济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③这里所說的經济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可以看成是个別事物或局部方面。这里的提法和《矛盾論》中关于从矛盾的各个方面到矛盾的总体的認識秩序的提法，通是一个意思。即由个别、局部“着手研究”，达到一般、总体的“了解”，由特殊規律达到一般規律。

由个别到諸多，由个别方面到全面，由分析到綜合，由特殊規律到一般規律，不仅是人类認識运动的正常秩序，也是科学工作者研究工作能力成长提高的正常秩序。大致可以这样說，越是处理較多事物或較长历史的研究課題，就越是需要多方面的基本訓練和多方面的知識积累；越是探索普遍意义較广的，也即抽象概括的层次較高的一般規律，就越是需要更加熟练的駕馭資料的經驗和更高一层的从事抽象概括的理論修养。

恩格斯說：“唯物主义的認識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靜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話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資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④“一个历史实例”尚且如此，何况是科学地闡明一系列历史的总体发展过程？

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是通过理論学习和工作实践去提高的。我們可以这样說，从某一事物的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矛盾的某一方面入手，乃是科学工作者研究能力成长提高的出发点。

过去我們有的同志在选题这一步上跨錯了地方，正由于忽略了这一点。他們常抱着一种范围要广、意义要大、层次要高的观点去寻找題目。他們常根据这种观点从經典著作上搬下一个題目，或者从报纸杂志上抓下一个題目，或者自己設想出一个重要問題。当然，所有这些題目未尝不是重要的，該做的，但是，对于尚未具备基本鍛炼的同志而言，这类題目有时就嫌过大，成为一个挑不起的負担。

不論从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說，或是从科学工作者研究能力的成长提高說，选定研究題目的一个原則是：先个别，后一般；先局部，后全体；先断代，后通代；先分析，后綜合；先具体，后抽象；先把局部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1頁。

②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頁。

③ 見《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2—803頁。

④ 《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7頁。



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搞清楚，然后进行全面的发展规律的抽象概括。总之一句话，从小处入手。

不过，这里所说的大小、先后，只是相对的意义，不能作机械的、绝对的理解。

说相对，首先是就研究题目本身说的。例如，相对于近百年中国通史而言，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可以说是个别事物、局部过程。但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本身又包含一系列事物的发展过程，如近百年中国工业史、农业史，近百年中国封建主义土地关系史、资本主义发展史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是近百年中国经济通史综合研究中所包含的个别事物或局部过程，对于它们的研究是一种分析的研究。而相对于这些研究内部所包含的许多问题而言，则这些个别事物、局部过程的分析研究却又变成了总体的综合研究了。例如近百年工业史就包含各工业部门的发展史，以及产品市场、资本积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以此类推，层层下去，局部之中还可以有综合。在这一个意义上是从局部的、分析性的研究开始入手，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从总体的、综合性的研究开始入手。因而，所谓分析性的研究和综合性的研究是相对的。它们的先后秩序也是相对的。

说相对，又是就不同的研究者而言的。同一个研究题目，对于从事这一专业的或有这样修养的同志而言，可能是较小的问题，对于另一专业的或有那样修养的同志而言，却还嫌其太大。例如各工业部门的发展史或资本积累、产品市场这类问题，对于通史工作者而言，可能已嫌其太小，而对于专门研究工业史的同志而言，却又是相当大的问

题。同时，已有深厚修养的同志处理这些问题，可能应付裕如；而经验不足的同志则又感到难以掌握。所以大小是相对的，它们的先后秩序也是相对的。

总起来说，每个科学工作者应该选择多大范围的研究题目，这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去具体考虑。不过，在相对意义的前提下，不论从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说，或是从科学工作者研究能力成长提高的发展过程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先后秩序还是适用的。

二、明确普遍联系的全面观点，从大处着眼

那么，人们又是根据什么准则去具体地考虑当前的具体情况，选定研究题目的呢？首先，我们说从小处入手，当然不是随便拣来某一局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就进行研究。列宁指责那些“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的做法，斥之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列宁说，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在这里，列宁所回答的问题是怎樣搜集事实，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对于选题问题来说，列宁所指出的原则也是完全适用的。这原则就是，“从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也就是从普遍联系的全面观点去掌握事实，从大处着眼去选定研究对象。

我们所说的全面观点、从大处着眼，有两

^①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个意思：一、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去确定研究題目；二、全面考察当前的需要与可能，据以规划自己的工作任务。

在經濟史的研究領域里，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濟科学和历史科学上的一般規律就是我們确定选题的向导。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規律、經濟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統一的規律、农业为国民經济基础的規律、生产資料优先增长的規律以及农业、工业、金融、貿易等各部門和生产、交換、分配各領域的种种規律，等等。只有以这些一般規律为向导，我們才能找得到、认得出經濟各部門、社会各階級局部过程中的本质的东西；弄清哪些是必須仔細分析的關鍵問題，哪些是可以含象的次要現象；从而明确各項研究課題的理論价值及其发展方向。

要抓關鍵問題，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誰都不願意把精力浪費在无关紧要的問題上去。抓发展方向，有时就被忽略了。科学上，有些問題是会分裂的，經過研究，一个問題会引起一系列的問題，并且会出现新的關鍵性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不会再产生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另一方面，一个科学工作者是要以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因而需要考虑今后若干年内的研究范围和当前研究課題的联系問題。这两方面就是我們所說当前課題的发展方向問題。

对于中国近代經濟史來說，还有其他許多特殊要求。在中国近代史上，人們可以看到封建制和資本主义制同时存在着，而且还可以在某些地区找到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农奴制的变和形态或殘存因素。有关这各种因素的一般經濟規律和历史規律也都或多或少地在发生作用，并且交互影响着。这就給

我們的选题工作和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認識中国近代經濟史的“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我們需要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的著作。

在这里，我們不可能詳細談論毛澤东思想对中国近代經濟史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毛澤东同志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原理，是我們从事研究中国近代經濟史的向导和指导；特别是关于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两个主要矛盾而前者又是最主要矛盾的原理，更是我們研究中国近代經濟史中第一位的指导原理。掌握事实，确定选题，都应该从这些原理出发。

說到这里，有必要简单提到經濟史这門学科的研究对象問題。

对于中国經濟史这門学科，人們曾討論过对象范围問題。这种討論是有益的。因为明确了这一学科的对象范围，人們自然也就连带地明确了这一对象和其他学科的对象的区别和联系。“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辯证法的宇宙观主張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①。我們明确了經濟史这一学科的对象及其和其他学科的对象的关系，就能使我們明确自己的任务，对于某些問題有必要既从經濟史的内部去研究它，——这是第一位的；又从經濟史和那些学科的联系中去研究它，——这是第二位的。

《資本論》的副标题叫做《政治經濟学批判》，这总是一部以生产关系为对象范围的著作。可是馬克思并没有拿政治經濟学的对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9頁。



象範圍去束縛自己的手脚。在《資本論》里既有关于工具、机器这类技术方面的专题子目，去談生产力的問題，又有关于工厂法、圈地法、殖民学說这类上层建筑方面的专题子目。原因很简单，为了闡述他所提出来的問題，馬克思有必要这样做。

但是，有个别同志却不是这样看問題的。他們倾向于抽象地規定一个对象範圍，并把这个範圍当作一个圈定的地区，用以限制自己的行动。例如，在具体分析中国近代經濟史上的問題时，有的同志就认为，如果經濟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史，那么自己的研究工作就不該考虑到生产力或上层建筑的問題，哪怕在这二者对生产关系发生重大作用时也不例外，原因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在經濟史的对象範圍之內。这就割断了这門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只是从它的“内部”孤立地去进行研究。其結果，就仿佛是，經濟史这門科学不是为揭示生产关系的发展規律服务的，倒是生产关系必須在經濟史这門科学的对象範圍以内去发展。这当然是荒謬的。事情應該是科学家去掌握科学，而不該是科学去掌握科学家。

有些专门从事某一部門經濟史研究的人，其选题範圍长期地局限在那一部門的“对象範圍”以内，很少从各部門的相互联系上去考虑問題。长期下来，这些同志很自然地就形成一种画地为牢的观点，孤立片面，鼠目寸光。对于这些同志而言，有必要明确个别事物的分析研究和总体事物的綜合研究的关系問題，这也就是专精和广博的关系問題。

讓我們再来体会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里那一論断的精神吧。毋須說明，綜合研究并不等于分析研究的总和。我們对

于“應該先作經濟史……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这一論断是不該从字面上去作简单的、机械的理解的。否則，邏輯的結論就会是，在完成經濟史等等部門的分析研究以前，通史工作者就不應該、也不可能撰写近百年中国通史。这当然是不对的。我领会毛澤东同志这一論断的精神无非是強調分析研究是綜合研究的基础。这并不妨碍人們在完成分析研究以前就去进行初步的綜合研究。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虽然这种研究是在比較薄弱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不受到相当的限制，然而却是有益的，它会反过来帮助分析性的研究，使分析的研究不致走上孤立的狹窄的道路。

在科学发展道路上，綜合和分析的矛盾将是永远存在的。取消了这个矛盾也就取消了科学的进步。

毛澤东同志又說过，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是認識的两个过程。“人类的認識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認識不断地深化。”^①这就指出了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的辯证統一的关系。

根据这一論断的精神，我們可以說：广博、綜合的研究需要在专精、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去建立、充实和提高，专精、分析的研究需要在广博、綜合研究的指导之下才能全面、准确和深刻；脱离专精、分析的研究，則广博、綜合的研究将有空泛不着边际之虞，脱离广博、綜合的研究，則专精、分析的研究便可能走入歧途。广博、綜合必須以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頁。



专精、分析为基础、为轴心、为出发点、为支撑点。由点线扩大为面；专精、分析必须以广博、综合为向导、为指导。掌握一般规律，才能高瞻远瞩，在全面考察中去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

因此，我们认为，研究经济通史的工作者至少需要精通一部门、一行业的专史，或精研某一重大问题，才有可能成其为通材；而专攻某部门、某行业专史或某项专门问题的工作者，也需要时时不忘通史，才有可能专精深入下去。综合与分析、广博与专精的这种关系，也是人们选定研究课题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一则以前人现有成果作自己研究的基础或向导，一则以当前研究课题为将来发展方向作准备。从小处入手，还须从大处着眼。

明确全面观点、从大处着眼的第二个意义，是全面考察当前的需要与可能，据以选定研究课题，提出工作任务。

在一门学科的范围以内，任何时候多半都会同时存在着各种主题范围大小不等、综合概括的层次高低不等的许多级研究成果（包括论著和资料）。这各级成果所已经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构成当代这门学科的科学水平。这是人们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现实的基础。

拿中国近代经济史来说。新中国建立以来，这个领域里的既有成果，是十分丰硕的，它们已超越旧中国若干年的长期积累。但其中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进程却是很不平衡的。简单说，在地区上，一般地偏重于沿海沿江几省和少数大城市，内地各省广大农村和众多的市镇较少；而各少数民族地区、苏区、边区、革命根据地，和一九三一年以后的东北、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关内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区，都是大块空白；在部门上，一般地偏重于现代工商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较少，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恰恰又占旧中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在生产关系方面，人们的注意力比较偏重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问题，论及封建土地关系和工商业行会发展史的很少，至于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则寥寥无几。在时代分布方面，对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历史，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而论著较多，而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不免相形见绌。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内，关于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的研究成果收获较丰，但专论起义的经济根源和经济作用的研究成果则较少。如果再看成果的表现形式，则资料多于论著。资料中片段摘抄旧文献的较多，整块编印档案的较少，精心加工的统计资料奇缺。论著中，短篇论文较多，成本专著较少；主题范围较大，综合概括层次较高的较多，而小范围分析研究较少；争论过的几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尚待提出的问题尚多。总之，空白的不少，薄弱的很多，发展进程不平衡、不成龙、不配套。我们这行研究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教学、科学研究和思想战线上的需要却又是全面的，并且是十分迫切的。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又一个矛盾。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要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要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要努力进行那些“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①。这也是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者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事实上，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应当像毛澤东同志在二十多年前告訴我們的那樣“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組織的状态”^①。据此，我們似乎可以这样說，分工以从事部門的、局部的分析研究，合作以从事整体的、全面的綜合研究；从全局观点出发，从大处着眼，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研究，一定可以在中国近百年經濟史的研究領域里，取得丰硕的科学成果。

三、摸清条件，作好准备，选定研究典型和典型的目的性、代表性、局限性

我們碰到过一些同志，他們滿腔热情地要做經濟史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們說，“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恰当的題目。”这是因为他們沒有对确定选题的具体条件，进行过調查研究，只是坐在那里想。对于这些同志來說，选题之道，首先是要行动起来，摸清客观条件。

前面說过，在一門学科以內，主题范围大小不等、抽象概括的层次高低不等的既有成果，构成这門学科的当代科学水平。这就是人們确定选题时應該了解的一項重要的客观条件。

就这方面說，人們也是会碰到矛盾的。大致可以这样說，那些已經經過好多人长期爭論的問題，已发现的史料是比較丰富的，各家分歧意見的焦点也是比較明确的，因此，从某一方面說，問題也就比較容易入手。但是，正因为这是經過前人长期钻研而尚未解決的問題，比較易得的史料多半已被前人所充分利用，所以这类問題多半比較微妙曲折，牽涉的方面很广，是难攻的堡垒。人們如果要对这类問題进行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全面

檢閱前人的一切論著，彻底审查其立場、观点和方法，严密校核其史料来源，并对各家主張进行比較分析。这些工作都是繁重的。要对这种問題的解决添加新的东西，哪怕是很少一点，多半也得花费极大的劳动。

反之，那些尙未經前人钻研过的、或者钻研得还不很多的問題，新鮮資料尙多，人們对問題的認識尙淺，所以也就比較容易有收获。因此我們认为对于某些同志來說，与其“攻坚”，不如从“开荒”着手。即对前面所說的那些空白和薄弱地带进行“开荒”工作。当然，“攻坚”也是需要的，其中有些問題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于剛做科学研究的同志來說，一般而論，不宜从“攻坚”入手。这并非“钻冷門”，而是从怎样便于提高研究工作能力着想，也是从填补空白的科学研究的客观需要着想。

經濟史料的現存状况是确定选题时必须有所了解的另一項客观条件。这就是科学工作者的“家底”。摸“家底”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拿图书資料來說，这就需要不少的目录学知識才能略知文献的主要内容。为此，人們就必须钻进图书馆里去，广泛地翻閱各种文献，了解史料情况。至于本地区可能存在的碑刻、档案、口傳史实等等，就更需要多方面去采訪了。

摸“家底”，人們很容易从量的方面去考虑問題。当然，丰富的史料文献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献的数量不多，可做的工作也就必然很少。同时，尽管文献的数量很大，当前入手的工作，也还可以简化，該做的工作就必然很多。工作量

^①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2頁。



的多少，一方面決定于文獻本身的數量和價值，另一方面則決定于工作者的主觀條件，而主觀條件，倒常常是關係很大的問題。

所謂主觀條件，有修養問題，也有看法問題。

這裏的修養問題，指的是對史料價值的敏銳力、識別力和對資料進行加工製作的 ability。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兩位研究工作者做同一個問題，遇到同一條資料，一位棄如敝屣，一位如獲至寶。這可能是由於二人考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因而對史料的取舍不同。但常常還是由於二人對史料價值的敏銳力、識別力不同，所以對史料價值的估計也懸殊很大。

對於史料價值的高度敏銳力、準確識別力和對資料加工製作的熟練技巧，是在學習中、研究中逐步提高的。但為了選題而初步學到一些本領，總是必要的。這可以從前人的論著中去學習。這個工作最好對前人所引用的資料按圖索驥地查出原書，把前人書中所引用的材料和原書加以對照。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學到一些目錄學知識，一方面也可從前人取舍資料、運用資料的方法上，去學習怎樣估計資料價值和怎樣做研究。對於統計資料，還要注意其加工改製的方法。這都是重複前人研究進程中的某一“工序”的工作。這樣做，好像是浪費勞動，其實對於初試研究工作的同志而言，卻是捷徑。不如此，不易學得本領。要知道，只看“制成品”是不會懂得“工藝過程”的。

這裏所說的看法問題，主要是眼高手低，不屑於做某些工作。

通常人們談論科學研究的選題問題，所謂“研究”，不言而喻地是指最後要寫出論著

來的那種工作而言的。有些同志認為如果只是進行資料的收集、整理、考訂、注釋、校勘、排比、分類、統計和編輯工作，而不寫出論著來，那就叫做“資料”工作，稱不上是“研究”工作。而言外之意，這所謂“資料”工作又比那所謂“研究”工作低一等，最好由別人去做。有的人一聽到要他做資料工作就惱火，仿佛這對他是一種輕視。這種把資料工作和研究工作一刀兩斷，並把它們對立起來的想法是錯誤的。這就是一種眼高手低的思想。

一般說，通常所說的資料工作是比較容易入手的，但卻不是容易做好的。這里一樣地包含着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而這些，豈不正是研究工作？人們可以看到有不少人把絕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資料”工作上，但絕對找不到不做史料工作的史學家。

對於某些同志來說，選題之道，似乎還要首先作好思想準備，然後從易于入手的資料工作入手。能把資料工作做好，就是貢獻。

眼高手低的另一種表現是迴避瑣碎的、細緻的、大量的艱巨勞動。這是在人們遇到大量資料時可能冒出來的思想情況。有時人們所遇到的資料，分量十分龐大，以致“不知從何下手”，“想來想去”，想不出題目來。在這里，確有一個如何入手、如何加工的技術問題。但主要的，恐怕還是心目中對“規律”想的太多，好高騖遠，眼高手低的思想在作梗。對於這些同志來說，選題之道，也還是首先作好思想準備，然後切實去做。只要做，就可能找到入手的辦法，而“想”却是想不出來的。

還有一個問題也可附帶說清楚，我們有時聽到人說：“我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對那



个問題硬是沒有興趣。”这就有点把个人兴趣凝固化了。其实，兴趣不是天生的，而是培养出来的。人們对于某个問題有了兴趣，这不过說明他对某个問題接触較多，思考較多，有問題、有发现罢了。如果人們拿起一个新的問題，勇于钻研，接触一多，自然就会有問題，有发现，于是兴趣就勃然而起了。这一点，也可算是确定选题的一項思想准备。

摸清了客观条件，作好了主观准备以后，就需要考虑問題的提法。

我們是主張从小处入手的。在一門学科里，每一級主題范围大小不等、抽象概括的层次高低不等的研究，相对于其上一級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研究而言，都可以說是“小处”，是分析性的专题研究，也就是一定意义上的典型研究。

人們常說，“典型調查”，“解剖麻雀”，“从一滴水去看整个世界”，意思就是說，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調查研究去发现全体事物的一般規律。这样說，有两个意义。一方面，这意味着在典型和典型所代表的事物之間，存在着个别与全体的量的关系。这个量的关系說明典型研究的必要性。因为人們对于事物全体是不可能、也不必必要一件一件地去进行調查研究的，只能通过个别事物去研究全体事物，以个别去代表全体。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典型及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存在着质的关系，即全体事物的一般規律存在于个别事物的特殊規律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或者說，全体事物的一般規律具体地体现在个别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

典型和典型所代表的事物之間的量的关系，即典型事物能够代表多大数量、多大范围的全体事物，取决于典型及其所代表的事物

之間的质的关系，即典型的个性能够反映多大数量、多大范围的事物的共性。这个质的关系，制約着典型研究的目的性、典型事物的代表性和研究結果普遍意义的局限性。

社会現象和生物現象有极大的差異。因而这两种科学对于典型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也就有了极大的差異。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解剖麻雀”的典型研究方法，并不能像生物学家那样地去理解和运用。

生物学家为了研究麻雀的生活习性而解剖麻雀，不存在个体麻雀是否有代表性的問題。因为麻雀这种生物天然具有一致性（姑且把品种問題含象掉）。因而任何一个麻雀都能作为全体麻雀的典型代表。生物学家随便抓到哪只麻雀都行。在这里，全体麻雀的共性、一般規律是可以和个体麻雀的个性、特殊規律画上等号的。

但是社会現象却不是这样。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作为自然产物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产物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关系上的各个具体事例之間并不像这只麻雀和那只麻雀那样天然具有全面一致性。它們可能全面一致，可能部分一致，也可能全不一致。于是典型的代表性就大成問題了。

例如，要是我們的目的是研究旧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性质，随便找来某些事例是不能解决問題的。如果把某些地区的个别新生的或残余的情况，当作典型来代表全国，便将是**以偏概全**，把个别新生的、或残余的东西，夸大成为基本的、主导的东西，把特殊規律夸大成为一般規律。

在上述条件下，我們当然必須选取汉族地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来做典型。但地主和农民之間，又存在着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



貸关系、政治关系、法权关系等各种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之間有联系、有矛盾，有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也有居于第二位的次要矛盾。为了研究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用說，必須抓租佃关系，即抓住主要矛盾。但租佃关系仍然不是一个内容那么单纯的范畴。它仍然有地区的差别、形式的差别、性质的差别等等复杂情况。这就是說，人們仍然需要更进一步抓住基本的、主导的东西，或者說主要矛盾；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虑典型的个性能在多大范围内反映其所代表的事物的共性问题。正因为这个緣故，所以我們对旧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就决不是抓住个别的典型所能解决问题的。

不仅如此，上面还是就首先确定典型研究的目的性，然后，从大量事物中挑选适合要求的典型而言的。这无非是要說明，人們在具体运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时，原则上必須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中、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根据事实严格审查典型的代表性和局限性。

事实上，我們搞經濟史研究工作，問題远比上述情况复杂得多。还是拿租佃关系來說，历史文献中有关租佃关系的記載本来就是不够全面詳尽的。我們所找到的，則又是这不全面中的一小部分。把这一小部分用来当作典型事例，并不能全面反映典型事例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我們几乎完全丧失了任意选择合用典型的自由。因此，我們研究的所謂典型，其代表性当然就更加縮小，局限性更加扩大了。

正因为这些緣故，所以，搞經濟史研究的人，常常不是像生物学家那样，首先确定典型研究的确切目的，然后按照目的性的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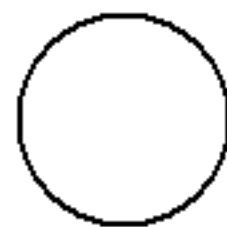
求去选择典型，考察典型的代表性，合則取，不合則去。倒是相反的，起初只能立下一个极其广泛的、一般化的目标，然后再根据所得事例的代表性和局限性去进一步規定典型研究的确切目的，于是，这就变成了：根据所得事例的代表性和局限性去确定典型研究的确切目的性。

根据所得事例的代表性和局限性去規定典型研究的确切目的性，几乎可以說是在經濟史工作者必須遵守的一条原则。实际上，这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問題。

違反上述原則，結果便将以偏概全，把特殊的东西說成是一般的東西。这是我們在研究工作中最容易犯的、最常犯的毛病。

根据上述原則，我以为对于典型研究的問題的提法要力避全称，例如中国如何如何，近百年如何如何，等等；对于結論要力避提的太高，推的太远，例如必然如何，完全如何，絕不如何，肯定如何等等。总之，我們要严格地根据資料的具体情况說話，根据典型及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的质的关系去規定其量的关系，把自己所找到的規律性严格地局限在典型事物所可能說明的范围以内，而不去夸大它。

最后，让我提出一个建議，即学习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語。这部书收集了一百七十六篇农业合作社的調查报告，可以說，就是一百七十六个典型研究。把毛澤东同志所加的按語和报告所提供的情况結合起来去体会，人們就可能学会，为了什么目的应该选择什么典型，什么典型又有什么代表性和局限性，目的性、代表性和局限性又如何規定問題的确切提法。



农村人民公社干部

应该加强经济核算观点

陈 因

经济核算，就是通过记账、算账，了解和分析生产中的劳动消耗和费用开支，要求以相同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是农村人民公社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重要的推动力量。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首先是生产队的干部，应该树立和加强经济核算的观点，十分注意节约劳动消耗，节省各种开支，学会最经济、最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

农业生产，并不是在集体化以后才需要经济核算。在个体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生产规模很小，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性质；那时，农民在生产经营上虽然不一定都有簿记，但是他们也都计算生产中的消耗，计算盈亏。马克思曾经说，个别商品生产者，有些单是在他的头脑中作簿记，农民就是一个例^①。在集体经济条件下，生产规模比较大，经营范围比较广，产品中商品部分的比重提高了，如果生产不能获得赢利，甚至亏损，就不是只影响一家一户农民的生活，而是影响许多户农民的生活和整个集体经济的发展。所以，经济核算

就更加重要。集体生产的经济核算，不能单在头脑中进行，必须有比较健全的簿记。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愈采取社会的规模，愈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簿记——当作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就愈成为必要”^②。簿记，这是进行经济核算的最重要的工具。

实行经济核算，不仅能够使我们知道经营管理结果的好坏、盈亏，而且能够知道：赚了，是由于哪些环节上工作做得好，人力、物力、财力使用得合理；亏了，是由于哪些环节上工作没有做好，人力、物力、财力使用得不合理。这样，就能够及时地总结经验 and 发现问题，不断地找出增产节约的潜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经济核算，对于生产中的劳动消耗和经济效果，对于所采取的生产措施，经常地在计划与实际之间，今年与去年之间，本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进行分析、比较、讨论、研究，有利于吸引社员群众参加生产管理，推动劳动竞赛，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

①②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3、145页。



方針。可以說，經濟核算是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員学会經營管理农业生产的最实际的学校。

在目前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物质基础还比較薄弱，特别是經過几年来連續的自然災害，农业歉收，許多公社的收入和积累有所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經營管理，精打細算，節約开支，把有限的資金、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它們發揮最大的作用，这对于农业增产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实际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在生产条件較差的情况下，只要采取正确措施，搞好經營管理，做好經濟核算，处处注意勤儉節約，凡事讲求經濟效果，仍然有可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依靠勤儉，依靠“穷办法”，这是过去許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現在許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一条基本經驗。而勤儉、“穷办法”，也是最符合經濟核算的要求的。

当然，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实行經濟核算，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漁）的項目繁多，产品多种多样；所用的生产資料，有购买的，有自給的（如种子、肥料等）；产品有出卖的，有直接分配給社員消費的；社員的劳动报酬，一部分是用货币支付，一部分是实行实物分配；在生产中采用某种技术措施，其效果往往需要較长的時間才能明显地表現出来；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强烈影响，产量和劳动报酬不容易稳定。所有这些，都是人民公社經濟核算比較复杂、困难的一面。但是，正

因为在生产經營上有以上的特点，建立精确的簿記，詳細地記賬、算賬，就更加必要。否則，就难以做好生产管理和收入分配工作。因此，不能因为經濟核算有以上复杂、困难的一面，就不去逐步地实行。

农村人民公社的經濟核算，就是公社各級，特别是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把生产經營上的各項开支和主要的經濟活动，进行計算、比較，以达到厉行節約，全面增加生产、普遍增加收入的目的。在这方面，农业合作化以来已經逐步积累了許多經驗，有了許多有利的条件。早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很多社队就已經初步建立了財務計劃制度、會計制度、現金管理制度和物資保管制度等；积累了包工、包产、包生产資料的費用（通常叫做包成本）的經驗；已經有把实物收支折合成货币同現金收支一起綜合計算的經驗。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經濟核算的要求。人民公社实行三級所有、三級核算、各負盈亏的制度，特别是生产队这个基本核算单位，有生产經營管理权和分配决定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負盈亏，这也是有利于实行經濟核算的。只要很好地总结这些經驗，充分运用这些条件，就有可能逐步地把經濟核算工作做好。

农村人民公社三級都要进行經濟核算，而重点是在生产队。公社和生产大队兩級的經濟核算，首先是对本身的收入、支出，对社办和大队办的企业、事业，进行核算；同时，尽可能对所屬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进行全公社或全大队的綜合核算。而生产队是



公社的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生产队生产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好坏，对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做好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工作就更为重要。同时，只有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工作做好了，生产大队和公社这两级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核算。

生产队作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单位，有自己的资金和生产资料，有固定在本队的劳动力，有采用一定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自主权。生产队的经济核算，首先就是要全面地计算全年生产中资金、生产资料等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全年的产品在补偿这些消耗以后，是盈余还是亏损，盈余多少，亏损多少。在正常年景下，一个生产队的生产是盈是亏，主要决定于经营管理的好坏，决定于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以及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采用，是否得当，是否合理。根据经济核算的要求，生产队的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要用于生产最急需的地方，尽可能多地投入当年能够得到收益的当前生产，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的开支和管理费用，适当控制短时间内不能见效的基本建设开支。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采用，必须从有利于提高总产量和总产值出发，从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出发。有些耕作措施，孤立地从一种作物或一季生产的产量、产值来看，可能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和其他作物联系起来，从全年或一个轮作周期的产量、产值来看，效果就不一定好，甚至是不合算的。有些措施虽然能够增加产量，但是所花的工本过大，结果收支相抵，不能

增加实际收益，甚至造成亏损。因此，在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时候，就需要全面地核算它们的经济效益。

决定生产能不能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增产，而且在于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成本越低，赢利就越多。因此，成本核算是生产队经济核算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了成本核算，就能够具体地了解产品生产中各项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其增减变化的情况，通过对这种比例关系和变化情况的分析、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因素，找到降低成本、增加赢利的途径。

严格地说，没有成本核算，也就没有完整的科学的经济核算，也就很难达到以同样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这一经济核算的基本要求。成本核算不仅在工业企业中是能够实行的，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同样是能够实行的。在个体经济时期，农民虽然不进行科学的成本核算，但是注意“保本”，“将本求利”，却是农民十分重视的问题。农民的“本”“利”观念是综合的，他们对产品一般并不分项计算成本和赢利。生产队的成本核算则要求更细致些，更精确些，既要有综合的成本核算，又要尽可能逐步地建立分项的成本核算。当然，建立比较精确的成本核算不是很容易的，有些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有一个由粗到细、由不精确到精确的发展过程。但是，只要认真地总结已有的经验，并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可能逐步做到的。

人民公社实行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促进



增产；而增加生产，又是为了满足需要，即满足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对农副产品的需要。因此，人民公社在核算经济效果，特别是计算赢利的时候，就不能仅仅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而应该在服从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把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这三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要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核算，公社各级干部应该树立明确的经济核算观念。无论是制定生产计划、改进耕作制度、采用技术措施、进行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等等，都要对开支和收益进行精打细算，反复考虑它们的经济效果。这些，都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群众也是有经验的，因此应该很好地同群众商量，向群众学习。

为了实现以同样的生产开支，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这个经济核算的基本要求，需要对于劳动用工、物资消耗、财务开支等事先定出合理的计划和限额，严格控制。特别是对于各种非生产性的开支，对于行政管理费用，应该严格按照计划规定的标准，尽可能地节约使用，绝不能随意超过。如果不注意节约开支，杜绝浪费，即使增加了生产，也不能增加收入，甚至可能减少收入。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从各方面堵塞一切铺张浪费的漏洞，不断降低非生产性开支和管理费用所占的比重，这是评定一个生产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农村人民公社中逐步做好经济核算工作，还有赖于财务会计工作的加强。人民公

社各级的财务会计人员，应该是既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办事公道，能够联系群众，又有一定的业务能力，会记账、算账，精打细算。从当前的情况看来，公社特别是生产队的财务工作人员有许多还是新手，还缺乏管理财务工作的经验，有些社、队的财务会计制度也还不够健全。这就需要大力地加强公社各级特别是生产队的财务会计人员的选拔、培养和训练工作，健全生产队的账目和财务会计制度。在账目和财务方面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切款项和实物的收支，都要有手续和凭证，做到账款相符，账物相符，账证相符，账账相符。更进一步的要求，还应该尽可能做好生产过程中重要经济活动（例如某种作物每亩用了多少种子、肥料、农药，用了多少工等等）的登记、统计工作。这样才能为经济核算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

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核算，财务会计人员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但是要做好这项工作，仅仅依靠他们还是不够的。公社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认识经济核算的重要性，掌握关于经济核算的知识，亲自动手，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经常帮助、检查财务会计工作，善于从财务会计人员所提供的资料中发现经营管理上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同时，还需要发动广大社员参加财务会计工作的管理、讨论和监督。把领导干部、财务会计人员和社员群众这三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努力，人民公社的经济工作就能够越做越细，经济核算就能够由粗到细地逐步健全和加强起来。



說 鞭 策

吳 介 民

鞭策，原意是用鞭策馬。在旅途中，当駿馬步履迟緩的时候，鞭策便成为前进中的一种助力。着鞭的地方可能感到有点疼痛，但鞭策的作用却在于推动、激励、召唤駿馬前进。

我們現在說的鞭策是一种借喻。来自同志，来自朋友，来自上級，来自群众的批評，就起着鞭策的作用。它是一种警醒，一种督促，一种开导，一种校正。我們的批評，既要誠懇、坦白，又要尖銳、深刻。它是鋒利的，能够发人猛省，但不伤人；它是善意的，讲究分寸适当，但又切中弊害。对于被批評者來說，鞭策的声音，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火辣辣地烤炙着痛处；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要采取虛心的态度，它就会帮助你去掉思想上的坐穢，給你带来卸却沉重包袱的輕快，給你带来前进的勇气和决心，給你带来将要在工作和学习上得到新的收获的衷心的欢愉。

“人苦不自知其过”，需要別人的鞭策。然而，別人的批評只有通过自己的觉悟才能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当自己的思想毛病还没有表现为行动，或者还没有明白显示出来的时候，別人往往不容易察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說，自我鞭策是更为要紧的。我們要

把別人对自己的批評和鼓勵，別人的长处和短处，別人的成功和失錯，都当作自己的一面鏡子，吸收經驗教訓，严格要求自己，督促自己。朱熹就說过：“开卷便有与圣贤不相似处，岂可不自鞭策。”^①这自然說的是过去的事情。在我們今天的生活和斗争中，以革命导师和先进人物为榜样，时时反躬自問，反躬自責，就可以洞察自己的缺陷，取得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向前进步的动力。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經驗吧。当你工作获得成績，有自滿情緒的时候，当你学习到一点东西，认为已經差不多了的时候，当你受到表揚，有点忘其所以的时候，当你碰到困难，精神懊喪的时候，当你走完一段艰苦路程，松懈下来的时候，当你有了缺点或錯誤，还没有認識到的时候，你从別人的正面或反面的事例中得到了启示，或者有人在你身旁大喝一声：同志，眼睛要朝前看，当心掉队啊！同志，你有病了，赶紧医治吧！于是，你蓦然驅逐了懈怠的情緒，振奋起来，抖擞精神，鼓足干劲，重新走上征途。这时，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对你再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了，过去的成就不过是使你获得另一个成就的起点；你眼望前方，迈开坚定的步伐，

^① 《讀书法》。《朱子語类》卷之二。



前进一步就是一个新的胜利。

鞭策是激发人们前进的力量，是革命者无时或缺的伴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可贵品质和崇高风格，并不在于他不会在工作中产生任何缺点、错误，因为这样的人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而是在于：他从来不企图掩饰和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并从中学习，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使自己所担负的革命工作做得更好。认真地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作风。我们与害怕正视和揭发导致本阶级灭亡的脓疮的没落阶级的人们根本不同，我们是先进的阶级的战士，我们坚信着自己的未来，我们深知自己的缺点、错误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的，是必须克服而且能够克服的。鲁迅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①

我们要善于在自己的同志间正确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善于接受别人对自己的鞭策和进行自我鞭策。俗话说：“快人一言，快马一鞭。”我们要努力使自己成为“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一言便醒的“快”人。难道作为一个革命者，有谁甘愿落后，不欢迎别人对自己的鞭策，不愿意进行自我鞭策，以便对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一切妨碍革命事业发展、妨碍自己进步的因素，及时地加以防止和清除吗？

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形，只要我们正确地对待，也可以成为一种鞭策。这就是形形色色的敌人对我们的欺负、嘲笑和咒骂。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的联合势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凭着武装到牙齿的威势，为所欲为，极尽其残暴之能事，妄想把中国人民压倒。在中国人民做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今天，帝国主义者仍然敌视我们，瞧不起我们，用武力威胁我们，用恶毒的语言嘲笑和咒骂我们，用种种卑鄙的手段企图孤立我们。这一切，都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反面教材。

中国人民是有革命志气的。任何困难和障碍都吓不倒中国人民，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敌人越是欺负、嘲笑和咒骂我们，我们越是要争一口气，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过去，我们没有向敌人屈服，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掀掉；今天，我们也要让帝国主义者瞧瞧：我们用不着向他们求乞，凭着中国人民的双手，也同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要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和落后这两座大山挖掉，在中国的大地上，建设起宏伟的美丽的社会主义大厦来。

当然，敌人挥动的大棒和同志之间的鞭策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恶意的攻击，目的是想把我们打死；后者是善意的帮助，目的是为了我们机体的健康。两者绝对不能混淆。但是，当我们在自己的队伍内部互相策励的时候，也不妨听听来自敌对方面的嘲笑和咒骂的声音，并且懂得怎样把激愤变成力量，奋发前进。

^①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美法交恶：

西方外交万花筒上的一个新镜头

張 振 亞

五月十七日，肯尼迪在华盛顿的贸易政策会议上，用不客气的声调反驳了戴高乐在十五日所说的西欧对美国应保持独立的讲话。他说：“我深信，大西洋的团结代表了历史的真正的进程——欧洲和美国联合力量已有十多年，现在不是有限的见识和猜疑能够分化得了的。我们的命运的方向是走向合作和信任，美国决心要实现这个命运。”

肯尼迪以财大气粗的姿态说，美国在西欧所“作出的努力比任何其他国家为大，只要美国一直在这样做，我们将继续参预有关那个地区的战争和和平的重大决定。一项统一的政策不可能既要求我们驻军而又要求我们不参与决定”。

在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还对法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声明表示了不满，说那样做“是在进入一种越来越危险的局势”，是在“削弱”“有效的防御联盟”。

美国总统针对他的盟国的国家元首发表这样露骨的指责，在战后西方的外交活动中是罕见的。一年之前，肯尼迪在巴黎同戴高乐会晤时，还把这位法国总统称为“垂诸史册”的“当代最明智、最英勇的人”，而

现在，这个“最明智、最英勇的人”却突然变得只具有“有限的见识”，并且由于“猜疑”而在竭力“分化”“大西洋团结”，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美国报刊透露，考虑到国际影响的重大，肯尼迪对他自己的发言，逐字逐句都进行了斟酌和推敲。可见，美国总统的激烈语言，是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一项严重警告。

戴高乐受到肯尼迪的申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的国际大家庭”里，法国只被看作是一个三等国。两次世界大战，法国都是战胜国，按照法国的想法，它应当同美、英平起平坐，但是由于实力不济，它在华盛顿当局眼中，一直是和居于战败国地位的西德同列一等。而现在，这个三等伙伴竟挺身而出，要以欧洲代言人的身份同美国唱对台戏。在肯尼迪看来，这对于美国的西方霸主地位的稳固显然是不利的。

肯尼迪对戴高乐的言论所以不能容忍，还由于这些言论的发表，正好是发生在美国积极推行它的“全球战略”的紧张时刻。为了实现美国统治集团进一步夺取和控制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迷梦，为了摆脱国内恼人的经济停滞和严重的美元危机，为了集结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同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抗，并妄图瓦解和消灭社会主义阵营，肯尼迪一直把加强对西欧国家的控制作为基本的环节。这也就是他的建立大西洋两岸“新伙伴关系”的真正目的。为此，他一直在西欧展开紧张的外交活动，要求西欧各国“在援助、贸易、财政、外交和防务”方面接受美国的领导；他千方百计地要使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便进一步建立它所希望的“大西洋共同体”；他提出了“一九六二年扩大贸易法”，以便应付西欧的“挑战”。就在肯尼迪艰难地进行这些努力，而成败尚未可知的时候，戴高乐偏偏提出了要在西欧否定美国领导地位的意见，这又怎能不使他为之暴跳如雷呢？

可是，不论肯尼迪怎样声色俱厉，剑拔弩张，他的对手似乎并没有表现丝毫畏缩。在肯尼迪十七日的演说发表后的第三天，戴高乐就在法国中部的里摩日城斩钉截铁地表示：“法国并不是由任何其他国家拖着走的”，“它希望有它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行动和政策”。

积在戴高乐胸中的怨气如此之大，这不是偶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印度支那、中东和北非的殖民地，正在被美国插手进去，有的已经落入了它的美国伙伴的荷包。法国为北大西洋集团提供了自己的人力和物力，但是它既无权得知美国在西欧的原子战略计划，也分享不到原子武器的秘

密……如果它是战败国，犹可容忍，而法国又偏偏是战胜国。

当然，在过去不容忍是不行的。在“马歇尔计划”时期，法国是西欧依靠美“援”最多的国家之一。受人之惠就得听人支配，更何况它无论是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或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都得依赖美国的军“援”来维持。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每年都要使法国已经涸竭的国库白白耗费掉十几亿美元，几十万法国军队被冻结在那里，国家的财政、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因此而一落千丈……显然，这一切都捆住了法国统治者的手脚，因而只能忍受华盛顿当局的欺凌。

现在，对美国绝对有利的局面已经在改变。一九五八年冬季法国宣布货币改革，一九五九年初共同市场国家开始实行内部减税，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国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好转，都使它对象华盛顿的依赖逐渐减少。在共同市场树立关税壁垒以后，法国极力抵制美国农产品的倾销，这对于美国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停止，更使戴高乐有可能拔出脚来插入到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去。在这个时期，美国为了保护脆弱美元信用，已经开始在国际金融会议上向巴黎求助。情况正像去年八月三日《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叫嚷的那样：“我们（法国）不再是马歇尔计划时代了，那时美国拥有对法国施加的极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而目前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倒过来了。法郎比起美元的脆弱来，成了强有力的货币，因此



看不出美国目前拥有什么真正的方法对戴高乐施加压力。”

法国已经有了些本钱，华盛顿当局对戴高乐的“紧箍咒”自然也就不那么灵验。相反地，美国无论在加强北大西洋集团、促使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建立西欧和北美的“新伙伴关系”，以及推行新贸易法等方面，都处处需要法国的支持，这就使戴高乐能够要求同华盛顿当局平起平坐，共享原子秘密。可是肯尼迪政府对于新的、变化了的情况，偏偏不肯刮目相看，特别是在原子秘密方面，对法国的防范反而更为严密，这就不能不导致美法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美国和法国的矛盾发展为这样一场新的斗争的危险性，美国统治集团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肯尼迪去年五月底赶往巴黎，会晤戴高乐，就是为了弥合美法之间的裂痕。据《纽约时报》评论员苏兹贝格今年五月七日的文章透露，肯尼迪和戴高乐当时甚至还“取得了一项巴黎将同伦敦一样受到华盛顿的平等对待的不成文协议”。只不过是后来——仍然用苏兹贝格的话——“事实恰正相反”罢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肯尼迪还亲自写信给戴高乐，向他说明美国不能给法国“原子援助”的“苦衷”，据肯尼迪说，他担心这会给西德开辟先例。至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原子合作”，肯尼迪说那是受了战时条约的约束，只能如此。

可是，这种解释并没有能使戴高乐信服。理由是：从一九四六年美国国会通过“麦

克马洪法”，不许向第三国透露原子秘密起，直到一九五八年止，英国从来没有取得过华盛顿的任何原子援助。这证明所谓“战时条约规定”不过是一句搪塞语。而一九五八年以后，英国之所以能取得美国的一些“原子援助”，主要是因为英国当时已掌握了原子秘密，美国为了同英国共同垄断核秘密并乘机加以控制，这才答应实行“合作”。不但这样，根据英、法一九四二年的一项原子秘密协议，英国在获得核秘密后，本应为法国提供援助，而英国后来的变卦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压力。至于说到担心会给西德开辟先例，戴高乐则是这样回答的：法国比美国更清楚地了解用核军备武装西德的危险，不过，这同法国作为战胜国而拥有核武器完全是两回事。

当然，不论戴高乐如何振振有辞，肯尼迪也是不会为之动摇的。借用路透社记者赫弗南最近的话来说，这是因为“肯尼迪政府关心的主要事情是把欧洲的注意力从核威慑力量的概念上转移开去，而转向建立常规部队，以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十个师的目标”。而戴高乐拼命闹着要拥有核武器，这不但有利于美国对法国的控制，而且也并不符合肯尼迪政府按照它的“总战略”对“盟国”军事力量所做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美国统治集团在核秘密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让步，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纽约时报》评论员苏兹贝格所说的：“他（肯尼迪）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很随和，在一些非重要点上有时还愿意让步，但在真正重要问题上



坚硬无比。”

戴高乐为了争取法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已经拿出了他认为最厉害的一着：号召建立一个同“盎格鲁撒克逊”脱离的大陆欧洲。法国打的算盘是：以共同市场为基础，另搞一个以法国为首的、排除英国的欧洲政治联盟，同美国相抗衡，打破美国通过北大西洋集团对西欧的控制。正像法国报刊所说的，戴高乐这个欧洲政治联盟主张的实质，就是要把美国排除于欧洲之外。《纽约先驱论坛报》更指出，戴高乐主张建立的欧洲，不仅是要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能够同美国对抗，在他看来，这第三个目的几乎同第一个一样重要”。

不但如此，法国还一直多方阻挠英国参加共同市场。戴高乐认为，肯尼迪政府支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是想“制止欧洲大陆的独立倾向”。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麦克米伦在今年四月访美时，已告诉过肯尼迪，如果英国终于因代价太高而不能进入共同市场，那么英国将被迫从西德撤回驻军，从而使北大西洋集团解体。这些话固然有威胁华盛顿的意思，可是，美国对这一情况却不能不加以注意，因为戴高乐阻止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初步计划倘若成功，不但肯尼迪政府为重新建立美国在世界的“优势”而设计的大西洋“合作”计划，会发生严重危机，甚至连北大西洋集团的现状都将难以维持。

严重的困难终于摆在肯尼迪政府的桌面上。当然，华盛顿当局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让戴高乐的“欧洲独立观念”得逞的。麦克

米伦六月初的访问巴黎，美国副国务卿鲍尔最近在西欧各国首都的旅行，腊斯克的即将访问波恩和他最近在华盛顿同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的频繁接触，都表明肯尼迪政府在准备孤立法国的同时，也在力求软化他的对手。双方的紧张的外交斗争正在急剧展开。

可是，华盛顿的统治者不论怎样绞尽脑汁，也很不容易改变这一现实：尽管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依赖美国，但是，它已不肯再无条件地受美国的控制，不安心于做美国的“保护国”，听任美国摆布。而且这还不仅是法国的戴高乐。关于这一点，西德《世界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今年五月四日就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这种不平等起初曾是必要的……今天是另一回事了。一般欧洲人越理解这点（指西欧日益强大），要求这个新兴欧洲的领袖创造欧洲自己的（核）威慑力量的压力则越大。”

苏兹贝格最近在论及华盛顿同巴黎的严重摩擦时会说，肯尼迪在对西欧的外交政策上犯了两个不应有的错误：自己欺骗自己和没有看出自己行动的全部严重后果。苏兹贝格主张，美国“必须承认（西欧的）现实，并设法加以适应”，“妥协尚可保住一些东西，执拗只能引向牛角尖”。这倒的确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的上计。不过，这位策士显然是忘记了，假设肯尼迪真是对戴高乐做出什么重大让步的话，那将会带来多么大的麻烦；而这显然又是美国统治集团所不敢想像的。



丑恶的“形象”

胡 思 升

美国的“形象”如何，这是美国朝野近来经常放在口头上的话题。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报道，“肯尼迪和他周围的一切人物都紧张地工作，树立白宫希望树立的形象”。不久前，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西雅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的“形象”问题又一次成为问答中的一个题目。腊斯克在答问时摆出笑脸说：“我认为美国的最好的东西表明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将大大加强我们在国外的形象。”

美国统治集团是用怎样的行动“加强”自己的“形象”的呢？

当腊斯克把“非常伟大的国家”和“最好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美国军队已源源进入泰国。因此，有个美国记者不无担心地问：鉴于我们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行动，我们的形象如何？腊斯克故弄玄虚地回答说，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有助于对你的问题发表意见”。

那么，有些什么反应呢？

虽然肯尼迪一口咬定美军进入泰国是应泰国政府的“邀请”，但是，被派做“主人”的人，却不敢公然承认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路透社发自曼谷的消息引述泰国外交部人士的话说：“泰国实际上并没有正式邀请美国派

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这个国家，而是在美国提出来的时候表示同意。”泰国《荣誉报》在一篇社论中也说，“美国这次派军驻泰，并不是出自泰国的请求”。这就奇怪了。“主人”并没有邀请“客人”上门，“客人”却全副武装，成群结队而来，这不是赤裸裸的“占领者”的形象吗？

其实，泰国当局对美帝国主义驻军的决定，完全是俯首听命的。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形象”过于丑恶，因此，他们对进驻的美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泰国政府要求美国把它的占领军部署在距离首都曼谷稍远一点的地点，理由是避免给人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国家已经被外国占领了。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泰国统治者心虚和遮丑的事实充分表明，美军的“占领者”形象，实在是太显眼太露骨了。泰国内政部长乍鲁沙天不安地表示：“我希望他们（美国占领军）不会带太多钱到这里来，致使香烟、大米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其实，泰国人民憎恶美国军队，还不仅仅因为美国军队会在泰国搞扰乱市场的勾当，更为重要的是，它蹂躏了泰国的主权和独立。无怪乎替美军捧场的泰国《荣誉报》也担心“泰国人民可能会因为美



軍駐泰而感到焦虑不安”。情况果然如此。泰国内政部长接着证实，在美軍进驻的一些地区內，已經出現反对美軍进驻的傳单。日本共同社发自曼谷的消息則指出：“可以預料，如果美軍单独驻扎的时间拖长，必然会同泰国人民发生摩擦。”許多事实证明，哪个国家中驻扎了美国軍隊，那里的人民总是要吃苦头，当然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強烈的反对。

在泰国邻居的眼中，进入泰国的美軍又是一种什么“形象”呢？美联社在一則調查东南亚反应的消息中承认，“美国由于派軍隊去泰国而遭到东南亚一些报纸社論的強烈譴責”。它又說：“某些最強烈的批評来自中立主义的緬甸，……所有报纸都譴責美国把海軍陆战队派往泰国的行动。緬甸的报纸說，肯尼迪把战争威胁带到了緬甸的大門口。”《柬埔寨电訊报》五月二十一日发表評論，指出美軍占领泰国是違反常理和根本没有道理的。

在东南亚国家中，所以有这样的輿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十分明显，美国出兵泰国，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这是美帝国主义对整个东南亚地区侵略部署的一个組成部分。肯尼迪政府为了推行它的所謂“总战略”，现在正日益加紧它对东南亚地区

的侵略活动。它在这个地区竭力筹划一个把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的軍事包围圈，而出兵泰国，正是其中的重要步骤之一。同时，美国的这一行动，也是企图把东南亚地区变成它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局部战争的“新战略”的試驗場。这一点，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也并不諱言。

狡猾的肯尼迪政府，为了逃脫泰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譴責，想尽方法掩飾它那副“占领者”的凶相。就在肯尼迪下令美軍进驻泰国的时候，他还花言巧語地說，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帮助保证这个和平国家的領土完整”。肯尼迪說这句话的目的，是企图反噬老撾爱国軍隊，想誣蔑老撾爱国軍隊“威胁”了泰国。說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花样了。肯尼迪之流嘴巴里的“威胁”，一向是这样解釋的：組織雇佣軍武装侵略古巴，說是为了消除古巴对拉丁美洲的“威胁”；武装干涉南越，說是在南越人民的爱国自卫斗争“威胁”了美国。如此等等。自己去搶別人的东西，还要反咬別人搶了他，这真是道地的強盜的邏輯！就連英国《观察家报》也不得不承认，說泰国遭到直接威胁的借口，“已經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不論肯尼迪政府怎样披上画皮，都遮盖不了它为了向外扩张和侵略而“紧张地工作”所树立起来的穷凶极恶的形象。

